

◇译者序◇ 员

## 译者序

2005年出版的由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和约瑟夫·拉彼德共同主编的《文化和认同 国际关系回归理论》一书从文化和认同概念对国际关系学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展示了国际关系学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视角,让我们了解到现代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动态。全书共由 15 篇论文组成,分为源个部分,这两位编者也是第一、六、十和十一章的作者。第一部分包括引言(第一章)和回顾国际关系中文化和认同的历史背景(第二章)。第二部分主要关注的是与新现实主义的批判的交锋,各篇论文(第三、四、五、六章)以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式和理论武器说明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文化的意义和地位。第三部分,焦点转向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文化和认同视角,包括关于环境主义(第七章)、女性主义(第八章)、后现代主义(第九章)和常规理论(第十章)。最后,第四部分对全书进行了总结(第十一章)。

作者的研究背景和章节概要

约瑟夫·拉彼德(再谢) 译

引言的作者即本书的编者之一约瑟夫·拉彼德现在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拉彼德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活跃的学者之一,把文化和认同的“回归”设定在国际关系理论化过程这个动态的语境中,提出了公认的文化和认同观念中范式转换术语解释。关

## 圆◇文化和认同 国际关系回归理论◇

于文化和认同只能用“回归”描述,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中,即使关注着文化和认同,但文化和认同以外的其他学科优势也同样值得重新发现、恢复并复兴。他引用了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 Hall)的观点,认为多年来,最有影响的西方的讨论都把群体描述为自然世界中有界限的客体。因果关系的假设把文化、认同、观念和行为结果联系起来。拉彼德突出了文化—认同关系的复杂性,他认为文化象征性地提供了描绘认同群体所必需的符号素材,但认同群体并不总是构成单独的文化,虽然每个认同都为个体或者社会履行着不同的重要功能,认同常常是保持不变的,但文化可能会改变。

在第一章的后半部分,拉彼德用相当的篇幅对本书的各章进行了概述和评论,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在此就不再赘述。

耶尔·戈特弗里德森(Joel W. Palka)和理查德·辛曼斯巴赫(Richard S. Tedlow)

第二章的两位作者耶尔·戈特弗里德森和理查德·辛曼斯巴赫目前分别是美国拉杰斯州立大学(Rajasthan State University)和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教授。戈特弗里德森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85年进入拉杰斯州立大学进行教学,研究古代政权、全球变化和 International 关系理论。他完成并编辑了很多部著作,其中大部分都是和曼斯巴赫合作完成的。他近几年的研究工作包括《古代制度》<sup>①</sup>和曼斯巴赫共同创作的《重新描绘全球政治:报复历史与重创未来》(Reimagining Global Politics: Retribution and the Future of War) (暂定书名),还有正在编辑中的《政治空间:全球政治中的新边疆》(Political Space: New Frontiers in Global Politics)。他目前进行的这些工作都是他一直从事的研究。近几年来,戈特弗里德森教授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① 戈特弗里德森(Joel W. Palka)和曼斯巴赫(Richard S. Tedlow)合著,《古代制度》(Ancient Regimes),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

待的时间较长,包括在剑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挪威的诺贝尔研究院等地做研究。他还和曼斯巴赫一起在日本(曼斯巴赫)和维也纳(曼斯巴赫)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讨论会,并且是英国国际研究协会和其他一些欧洲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的活跃分子,在这方面他和本书的编者克拉托赫维尔十分相似。

曼斯巴赫写第二章时还在俄亥俄州大学。他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他发表了很多有关这个主题的作品,那时他就参与了近 50 部著作的写作和编辑,是一位高产的学者。他写作或者编辑的著作已经有十几部,这些书包括《政治 :权威、认同和意识形态》<sup>①</sup>、《令人困惑的探索 :理论和国际政治》<sup>②</sup>、《寻找理论 :转向全球政治的范式》<sup>③</sup>等。两位作者引导国际关系学理论者“全球政治涉及的是‘政体’的世界而不是国家的世界,并关注权威、认同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两位作者在 远个精心挑选的案例研究中论证了这种理论的重新定位,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威斯特伐利亚“相似单位”构成的、呈匀称状态的世界很难维持。他们没有运用那些抽象概念和解析,

[illegible]

② 砸碎醋辛癩瘰癧 栽藥造毒藥匠藥賊 栽藥割草當仇藥匪藥控名藥降  
（惟操再獲云拐強盜社，恠罪自費務稅：故爾爾爾數零幾對刑罰庫別降 另賜愛

[illegible]

而是轻松地运用历史案例分析,把文化和认同富有成效地应用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政体上。但第三章的作者文特不是这样分析的。

亚历山大·文特（~~粵語聲帶劇宰漢性賊~~）

1985年,亚历山大·文特在明尼苏达州获得博士学位,并开始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90年转至达特茅斯学院(1990年转至达特茅斯学院),从1990年至今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政治学。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政治理论的文章,本书的第三章就来源于他1995年发表过的一篇论文。1998年他发表了《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并由外交学院的秦亚卿教授译成中文<sup>①</sup>,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有关建构主义理论分析的兴起与这本书有很大的关联,文特也是中国学者们公认的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目前正在研究两个课题,一是世界国家(1998年发表过)成为必由之路的原因,另一个是社会科学中量子力学(1998年发表过)的不确定涵义,我们也期待尽快看到他这方面的著述。

第三章《国际政治中认同和结构变化》源自文特较早的一篇文章<sup>②</sup>。他谈到,国家体系是否为无政府状态,取决于本质,即成员国家都认同的国家功能的展现,特别是安全功能。可以说,如果国家只认同它们自身,那么国家体系就会成为无政府状态。如果国家认同世界国家,那么国家体系就会分等级,就好像由联邦政府统治的 48 个州构成的美国,是作为一个统治集团而不是无政府状态。而且如果它们彼此认同,如它们有互相合作的集体认同,那么它们会构成一个松散的权威体系,既不是无政府状态也不是什么统治集团。他在这一章中主要关注了国家之间形成集体认同的原因,用以探讨形成国

① 亚历山大·文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

**②** 粵語草創「幸漢世成」悅望萬葉隨其近繼云興有賴吐莽苗賊藥附刺陣操造  
烈藥，對粵有聲壯馬勇善若梅英莫碩增恩圓 允德弘暖

际性国家(国际体系)的运动及变化。

他认为认同的形成与主流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新现实主义者或者新自由主义者没有太大的干系,因为他们走在认同构成的反面,他们认为国家的认同和利益是给定的。然而,许多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都把国家认同及其结构变化作为问题。尽管它们表现为批判的、反思主义的或者建构主义的各种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建立体系理论时使用的多为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经济学的方法。

纳伊姆·伊纳亚图拉(奈伊姆·伊纳亚图拉)和大卫·温布萊尼(大卫·温布萊尼)

纳伊姆·伊纳亚图拉在写第四章时是锡拉丘兹大学(奈伊姆·伊纳亚图拉)迈克斯韦公民权和公共事务学校助教。他讲授国际政治经济、第三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他参与主编了《作为政治空间的全球经济》,现在正在研究历史上欧洲的“外部他者”观点。第四章的另一个作者大卫·温布萊尼是麦卡莱斯特学院(奈伊姆·伊纳亚图拉)的政治科学副教授,1989年进入该学院,1997年获得该学院的终身职位。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还有全球划时代的民主理论。他讲授国际政治基础、发展政治学和主持国际政治研讨会。他和伊纳亚图拉的研究背景有很多相近之处,所以两人联合发表了很多论文,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失败》<sup>①</sup>、《走进民族的 阿诺·卡尔·波拉尼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sup>②</sup>、

① 奈伊姆·伊纳亚图拉和大卫·温布萊尼合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失败》,载于《国际政治》,1998年,第1期,第1-15页。

② 奈伊姆·伊纳亚图拉和大卫·温布萊尼合著,《走进民族的 阿诺·卡尔·波拉尼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载于《国际政治》,1998年,第1期,第16-30页。

① 阅报登载月报灾情并呈请 附前附报挂马通泰港耕种老农等  
 拜况灾情案内老农等呈，登阅老农等呈情案内通泰港耕种老农等  
 灾情并呈 附前附报挂马通泰港耕种老农等呈情案内通泰港耕种老农等  
 拜况灾情案内老农等呈，登阅老农等呈情案内通泰港耕种老农等  
 灾情并呈 附前附报挂马通泰港耕种老农等呈情案内通泰港耕种老农等

② 呈请 附前附报挂马通泰港耕种老农等呈情案内通泰港耕种老农等  
 拜况灾情案内老农等呈，登阅老农等呈情案内通泰港耕种老农等  
 灾情并呈 附前附报挂马通泰港耕种老农等呈情案内通泰港耕种老农等  
 拜况灾情案内老农等呈，登阅老农等呈情案内通泰港耕种老农等  
 灾情并呈 附前附报挂马通泰港耕种老农等呈情案内通泰港耕种老农等

关系理论中”。

苏亚塔·查克拉巴蒂·帕西克(苏雅塔·查克拉巴蒂·帕西克)

第五章的作者苏亚塔·查克拉巴蒂·帕西克在写这篇文章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博士生,正在完成她的学位论文——“重新考虑国际关系中的文明概念”。她认为文特(文特)和布赞(布赞)在修改他们有关国际体系的标准现实主义的论述时,只是含蓄地提到了文化因素。文特强调内涵的共有,但不愿意明确地运用文化,他不想明确文化的地位,所以只好设想静态国家,并且固守国际关系领域空泛的界限(国家社会、国内国际)。她也指出布赞使用了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的概念,但他认为存在没有社会的国际体系,而不存在没有国际体系的社会,所以逻辑上,体系比社会更为基本、更为优先,但是他不太愿意触及文化的复杂因素。作者比较推崇怀特的《国家体系》,她认为虽然怀特一直没有明确定义他的体系或者文化概念,但是他使用了“目的”这个词,还使用了“体系”这种本质上具有文化统一和“关系”涵义的词,不只是像理性主义那样把“关系”理解成互动,这就形成了重要的对比。斯宾格勒(斯宾格勒)、汤因比、怀特和其他人在试图理解世界政治时采用了非常不同的“国家”范畴。根据切实的研究,这些文字揭示出联系并分离“文化”术语与“文明社会”的方式。换句话说,国家(民族的)和体系(超民族的)认同是通过历史文化的统一要求而在社会在建构的。这篇文章是理论化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的实例,作者从欧盟的一体化中看到了地区合作之外的“欧洲”观念,也就是说,像社会生活中许多体系和制度一样,国家体系并不是严格的国家结构。这一章让我们对文化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

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是本书的另一个编者,他和拉彼德一起撰写了第六章《重访“民族”探讨新现实主义中的认同》,他也是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作者。他是德国人,原为德国慕尼黑大学的

## 愿◇文化和认同 国际关系回归理论◇

教授,现在是《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主编。和其他的欧洲学者一样,他也熟练掌握着多种语言,包括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能够熟练地引用古希腊的文献资料。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还有两个他认为的专门领域就是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他在德国完成了大学教育,并于 1972 年在美国的乔治城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1974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科学的博士学位,1976 年还当上了美国国防部的顾问。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他的主要学术活动都集中在欧洲,但是由于他同时具有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知识背景,他能够把国际关系学的实用主义和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奠定了他在欧洲国际关系学界的地位。

克拉托赫维尔和拉彼德在第六章中,从“民族”问题展开了思考,探讨了新现实主义中的认同倾向,剖析了新现实主义分析世界秩序的主观因素。他们讨论到了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论题,即把“社会”和“认同”联系起来,那么置于“社会安全”话题中的“民族”会具有非凡的意义,只有成功“进入民族状态(火葬和埋葬)”的社会才会承认自身是一个有效的“主格我们”群体。可是,如果我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社会”而是经验丰富的群体忠诚和认同,那么“进入民族状态”这种进步的价值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最近的事件已经证明,多种族“社会”要把民族作为社会认同时,常常是以失败告终的。种族和宗教团体很容易形成,而且这些团体也能够有效地调动“主格我们”的情绪,但“社会”在这方面就不那么成功,因此,“社会安全”与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是存在距离的。这里,两位作者对“社会安全”概念颇有微词,怀疑“社会”现在成了新的理论“垃圾桶”,并且需要划分“区域”和“社会”的分界线。这样,他们又把国际政治中的分析框架重新限定在了国家和体系的框架内,恢复到国家作为惟一行为体的旧理论上。但是他们谈到的“社会安全”确实是当前国际政治中应该积极探讨的热点问题,这使我们又回到了“认同”问题。



第十章《公民权：在秩序的边界上》，从“公民权”把我们引向“属性（~~遺傳性~~”和“身份”（被理解为一些不同权利的集合），并且根据社会“成员”的多样性展开了对认同和忠诚的讨论，把“参与”和“成员资格”认同为公民权的两个核心成分。他认为“文化”是从社会具体身份中解放出来的个体的构成，是“民族”的构成，而“民族”成为“想象的共同体”，赋予个体权利并要求履行特殊义务。更正确地说，公民权是从民族组织和普遍规则的表达中形成的，并改变了地方环境的政治文化。

第十一章结语中，他在“体系”、“历史性”和“内涵”这些具有启发意义的题目下讨论了文化和认同，并对文化和认同的针对性进行了讨论，指出文化和认同对个体来说并不够具体，但是他似乎忽略了这样一点，即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并不只是单个的人，而且文化和认同也存在个体和集体的区别。

通过克拉托赫维尔的这几篇文章，我们体会到一位年长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风格。一方面，他知识渊博，另一方面，他固守自己的知识体系，遵循逻辑的严谨，这可能也从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德国人的标准化意识，或者说规则意识。尽管他在文章中批判了迂腐，但是他自己走得也并不远。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墨守成规使我们失去了尝试的机会，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作为学者不应该因为难以界定某个概念就拒之于千里，“社会”概念难以界定，但同时它也是国际关系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理论的发展也是不断超越自身的过程。第七章的作者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学者。

丹尼尔·德德尼（~~丹尼尔·德德尼~~）

丹尼尔·德德尼写第七章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社会科学副教授，现在是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主要讲授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政治科学和环境政治，他已经公开发表了很多关于核武器、共和主义、地缘政治学和环境政治的著述。

## ◇文化和认同 国际关系回归理论◇

第七章《土地上的认同：民族主义中的自然、地方和距离》首先给出了有关民族和土地缘个命题，并就地方、国土和民族进行了讨论，认为世界大同主义中不存在固定位置，并把美国民族主义中的空间和自然地点作为专门的议题进行讨论，他也对地球民族主义和地球认同、现代国家民族主义进行了探讨。

安妮·蒂克纳（Anne Tickner）

第八章的作者安妮·蒂克纳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女性研究的独特视角给她带来了国际关系学界较高的声誉。她的著作有《自我依赖与权力政治：美国和印度建立民族国家的经验》、《性别化的世界政治：后冷战时代的论点和理论》等。第八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认同：女性视角》中蒂克纳的女性主义理论涉及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正是国际关系中的中心问题。她指出，“当主流理论开始逐渐承认国际关系中的认同问题时，认同已经是当代女性理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蒂克纳的分析让我们认识到很多主题都能够从对性别敏感的语境中得到启发，女性主义和国际关系学应该通过学术上建设性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在第八章中，她从一些女性主义理论来展开分析，让我们对当代女性主义研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也确实使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对认同概念有了另一种阐释方式。

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

第九章的作者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跨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主任，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和欧洲政治哲学。尽管他在欧洲从事研究工作，但是和美国的学术界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参与主编的“边缘地带”系列丛书（The Marginal Zone）已经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他出版了好几部专

著,包括《书面的安全》<sup>①</sup>。坎贝尔在第九章《暴力职能:认同、主权、责任》中“重新描述国家”、“重新想象美国”,并重新考虑“国内国外的‘巴尔干化’”,对美国 and 西方对巴尔干危机(月建社糟译的政策进行了彻底的种族政治的批评,突出了美国国内外关于“国家利益”、“多文化主义(宅复能建社糟译)”和“种族冲突”的辩论。“可解构性(尚建社糟译)”是坎贝尔论点的中心,表明了一种后现代的观点,反对“原理”和“实质论题”。他认为,“如果没有解构,可能就没有种族、认同、政治或者指责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实世界中的认同和社会都是有种族的,而且也是有政治力量的。

### 关于这本书的评价及其他

“科学”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美好的词汇,通常学者们也认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有证明了自身的“科学性”,才有权利获得学术界的“合法承认”。因此,当“文化”和“认同”在 20 世纪末重新回到国际关系学理论中的时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很多学者就此展开了讨论。文化和认同缺乏“科学性”一直就是反对者最充分的论据。尽管大部分主流观点只是在最近才开始承认文化和认同的重要性,但是,国际关系学中的反思主义 建构主义 后现代实证主义 后现代主义 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精华都源于对文化和认同要素的研究。全球国际形势的转变,还有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的转变,它们都与文化和认同密切相关。很多理论研究者注意到,国际秩序本身从文化上发生了变化,在这种背景下,这本书揭示出了文化和认同“回归”国际关系理论所展现出的新的契机。书中的作者们以各不相同的研究角度,为文化和认同进行了辩护。

这本书涉及各个学科的成就,试图使国际关系中有关文化和认

① 阅读此书,你会发现,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出现了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见坎贝尔

同问题的学术讨论变得生动。但是作者们并不否认,“没有研究文化的方法论”。书中的各种观点虽称不上面面俱到,但也反映出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多重理论的切入点。书中的各篇论文几乎都没有详细地阐述国际关系中可能产生的、有关文化和认同的众多疑问,但是都谈到了提高国际关系学理论知识水平所要面对的、具体的基本问题,当然这些论文的目的并不是抵制主流理论。由于每个作者都是按照自己的论题进行分析或者论述,因此这本书的内容主题看上去有些分散。尽管有“文化和认同”作为全书的主线,但是作者们各自不同的研究背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本书的整体性,所以我也没有按照先后顺序一一介绍。

本书的作者着重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国际关系学理论一直缺少文化和认同观念的原因,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对文化和认同研究的具体问题,对文化和认同概念进行定义,并提出了在研究中融合这些概念的某些具体方式,还提出了文化和认同概念可能造成的问题。这些作者并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是他们都认为文化认同理论可以在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时代对国际关系学理论起到重要的矫正作用。尽管这些作者之间也存在分歧,但他们都确信文化和认同问题的重要性。

理论研究者应该能够客观地、公正地认识事物,但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们通常都会受到主流理论流派的左右。尽管这些成熟的理论已经被证明是科学的或者合理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转引自《社会性动物》)中的观点:“决策会导致不协调。”<sup>①</sup>无论是选择电器,还是选择恋人,一旦人们作出坚定不移的承诺,就会强化他们选择对象的正面信息,而弱化未选择对象的正面信息,以求获得

---

<sup>①</sup> 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40—141页。

自己的决策很英明的安慰,所以人们在处理信息时是存有偏见的,甚至歪曲事实以使其符合自己的认知。国际政治的研究者们通常都有明确的理论观点,但是这样就会妨碍他们作出新的选择,从而忽视新的理论或者新的理论视角,而真正令人鼓舞的正是那些新的理论或者新的理论视角。理论也是发展的,不可能停滞不前,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那些科学的、合理的理论就扼杀新的理论倾向。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过时的理论呢?实际上,国家间政治的内容也有很多是微观的,理论研究者也应该注意到微观的国际政治。国家领导人的对外言行固然重要,但足球明星的表现也同样可以纳入研究的范畴。这样也可以增加文字的可读性。从物理学上来说,宏观磁场是由所有的微观磁场合并在一起构成的。如果国际政治理论的读物也能像社会学的读物一样吸引读者,一定会产生更多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国际关系理论也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就我个人而言,文特的文章说理性很强,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但恐怕读者寥寥。

我很喜欢本书第二章开头部分的一句话,“如果理论不能够说明当日头条新闻的读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个理论,并取代这个理论。但是,用什么来取代呢?”文化和认同理论并不能够取代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一种理论方向。我们知道,理论和现实总是遥相呼应的,现实总是不断地呼唤新的理论。我们承认并接受的很多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建立在我们观察到的现实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就是一个实例,但是把常识理想化却是行不通的。无论如何,我们完全相信的理论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常识性的理论观念取决于它对某个具体情境的适应性。我们很难想象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浪漫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应该走在浪漫主义的反面,那么浪漫主义的反面不正是实用主义吗?就现实的国际政治而言,传统的地缘政治已经不能够从理论上指导不是由惟一的中央政府进行的国际交往,国内地方的国际交往,世界不再是基于安全考虑的地

源◇文化和认同 国际关系回归理论◇

缘战略矛盾。<sup>①</sup> 文化和认同就是以其实用性在国际关系学理论中占领了一席之地。

本书的作者大多是欧美学者,用两位编者的话说,“尽管这本书提倡学科间的研究并激励着新的理论,但是它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都限定在西方传统范围内”,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分析(如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甚至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够客观,是站在一种对立的角度分析问题。为此,在书稿中对这些问题已作了适当处理,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这部分内容时能够正确把握并客观对待。

另外,在这里要感谢王逸舟教授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的悉心指导和袁正清先生的翻译意见,还要感谢徐世澄教授对第二章中一些古代美洲专用名词的翻译,还要感谢王青山先生对翻译工作的支持和对第二章和第十章的校对。因本人水平所限,书中译文若有不妥之处,请读者不吝赐教。

金摇烨

圆园园年岁末于北京

---

<sup>①</sup> 参见庞中英翻译的《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译文。

## 中文版序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文化和认同重新产生兴趣,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回归文化和认同的势头远没有结束,自我们  
员缘年共同编辑的这本书出版以来,西方学者们对文化和认同的兴趣已经愈加浓厚。当然,这很正常,因为像全球化这种加速呈现的历史趋势,还有像“~~怨~~”这种动人心魄的恐怖主义事件都愈加显现出文化和认同的理论意义及其实用性。《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这本书预见到了这种趋势,并进一步地描述了对大千世界里文化和认同的较为全面的理解,深刻精妙地理解不断变化的文化和认同的复杂性。越来越多的学科都努力使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文化和认同非自然化(~~当建~~),针对这种情况,这本书着重强调了知性(~~当建~~)和学术孤立。该书突出了包罗广泛的学术性对话和大量的协作交叉。我们希望,这本书通过文化和认同使西方社会理论与相关领域的国际研究达到更显著的整合。当然,尽管这本书提倡学科间的研究并激励着新的理论,但是它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都限定在西方传统范围内。因此,这本书引发的讨论也显示出特殊制度和特殊历史与涉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文化语境。换句话说,这些主要牵涉到特殊的历史张力(~~当建~~),而正是这些张力造就了“西方”的历史舞台。中国读者承继了千年的文化传统——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当代革命家也经常提到这个传统——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分析可能

具有一种令人难解的理论进取意味。

可是,在《文化和认同 国际关系回归理论》出版以来,这些方面已经发生了相当可观的进步。任何单一学科的特性或者孤立学术团体的单一利害关系,都不再倾向于灌输并塑造变动着的国际关系的学术对话和建设性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议程,而文化和认同的概念现在则具备了这种趋向。尽管这本书微乎其微,但是它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和认同进行了这种积极的重新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满意的。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令人激动的机遇,可以进一步地以崭新的、未知的方式丰富西方国际关系学有关文化和认同的对话并赋予其新的活力。《文化和认同 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的作者是具有多种理论视角的国际关系学者群体。可是,如果检讨过去,显然作者们的这种多样性是不充分的,没有充分地吸收变动的、富有成果的非西方资源。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轨迹,并经历了几个积极的转变,例如,值得一提的有,国际关系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学派”思想的转变,他们从狭隘地专注于“国家体系”转向更加包容的“世界历史体系”分析的见解。因此,欧洲或者西方的国家体系失去了很多固有的说明性的效力,把“民族间(国家间)国际关系”分析成其他社会形式——它们可以是帝国或者部落——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中文版的《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有助于更广泛地展开国际关系学的文化和认同讨论,使讨论具有更加包容的、跨文明的语境。

约瑟夫·拉彼德

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

二〇〇四年 五月



# 第一编

## 引摇言